

邵洵美在孤岛时期的抗战文艺活动述略

张新民

内容提要：不论以什么标准来判断，邵洵美都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满腔热忱的爱国者。在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用坚守一个作家、一个文化人应尽的职责来报效祖国和民族，通过办刊和创作服务于中国的抗战事业，是令人敬佩的。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地位，这里勾勒其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概貌，以期世人对邵洵美在民族危难之时的所作所为有所了解。

关键词：邵洵美 抗战文艺 孤岛时期

邵洵美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以往学界多专注他30年代的文学活动，却忽视了在虎狼肆虐、风沙扑面的生死存亡之际，在抗战大是大非的抉择上，邵洵美断然拒绝了当时的汪伪政权和附逆的弟弟邵式军的拉拢和诱惑，保持了一个中国文人的民族气节，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仍默默地通过办刊和写作，为民族抗战事业尽心尽力，其所作所为，这是令人敬佩的。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抗日情绪顿时激昂。由于受环境的影响，邵洵美出资主编或编辑的刊物《论语》（1937.8）、《时代电影》（1937.8）、《声色画报》（1937.8）等分别相继停刊。他创办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时代印刷厂也先后停业。其时，邵洵美携家避难，从杨树浦逃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邨妹妹邵云芝家。9月，因桃源邨住处地方狭小，人声嘈杂，无法写作，在友人项美丽的帮助下，搬迁到一个回国度假的美国人的住宅，地点在麦尼尼路（今康平路）。为了维持生活，邵家只好靠典当首饰等物品度日，但也无法为继。邵与项合作写文章，一时使邵摆脱了日渐拮据的经济困境。后来在项美丽的帮助下从杨树浦抢运出日用物品、书籍以及影写版印刷机器。

《时代电影》月刊复刊，时代印刷厂也曾一度短暂在徐家汇重新开业，接印《中华画报》、《良友画报》等，但由于战乱，《时代电影》月刊出版“12月号”后终刊。只能以写作为生的邵洵美由于稿子的出路问题，经济来源几乎断绝，为节

约开支，被迫第三次搬家至霞飞路1802号（今淮海中路1754弄17号），这里属于当时的租界管辖范围。邵以此为立足点，开展办刊、创作、和外国文艺界友人的交往活动。

邵洵美的文艺活动主要以《自由谭》、《中美日报》为主，同时包括英文刊物《大英夜报》，还向《天下》（吴经熊、温源宁等编辑）、《纯文艺》、《南风》（林徽音编辑）、《宇宙风》等刊物投稿。在抗战前期，邵有时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也有不少外国记者经常到邵的住所求助。邵洵美正是以此为依托，积极为抗战服务，宣传民族抗战，并及时向世界介绍我国的抗战进展情况、国外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他和困守在上海租界的外国文艺界的友人进行广泛的交往，互通并传递有关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信息，向国人介绍外国文艺界的动态和文艺友人的活动，利用上海租界这个特殊阵地，架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为民族抗战做出了一定贡献。

—

1938年7月14日《大英夜报》中文版创刊，终刊于1946年7月31日，发行人是英国侨民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总主笔是孙特司·裴士，由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出版，实际负责人是暨南大学教授翁率平和邵洵美等人（邵是股东之一）。该报时常刊登反对日伪的文章。邵一度为该报写社论，每周3篇，工作很紧张。^①该刊发刊词具有鲜明的抗战色彩：“本报的发刊，是同人自誓，为上海社会服务，为在黑暗中生活的三四百万中国人，撑起一个大火炬来。……在这明耻教战的年代，执笔持论，该当顾念到言论家顶天立地的人格。”^②

更引人注目的是《自由谭》。《自由谭》月刊创刊于1938年9月1日，停刊于1939年3月1日，共出版发行7期。编辑人和发行人皆署名为项美丽，实际编辑是邵洵美。其英文名称为*Candid Comment Chinese Edition*（即*Candid Comment* 直言评论的中文版），在出版《自由谭》的同时*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也与读者见面。^③

该刊到底是不是由邵洵美实际主办，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略做分析，也许可以较为明确地理清这一事实真相：第一，从该刊的栏目设置看，《自由谭》所设置的“自由谭”栏目和“编辑谈话”栏目，不论从内容还是语言形式看都难出项美丽之手，也非其所能为；刊物中大量有关抗日宣传的木刻版画和插图也应出自邵洵美之手。第二，从该刊的主要撰稿者来看，该刊的主要撰稿者如胡适、曾迭、张若谷、林徽音、林达祖、章克标、明耀五、徐訏、徐迟、杨刚等大多是邵过去办刊的长期合作者或相识熟悉的人，很明显不是美国人项美丽所能联系网

罗的。第三,仅就邵洵美个人发文来看,邵在《自由谭》上以“逸名”、“忙蜂”、“都仁”、“钟国仁”、“闲大”、“邵年”等笔名以及“邵洵美”的名字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和时事信息报道等,其中文学作品13篇;“自由谭”栏目和“编辑谈话”栏目各种短论、随笔或报道共计77篇;“谭助”栏目里各种文坛消息计有数十则。由此可见,该刊是以项美丽的名义创办出版的,实际上的主办者是邵洵美,已确定无疑。

在创刊号《自由谭》专栏里谈到“本刊的命名”时解释说,首先因为编辑既然是美国人,所以以《自由谭》作刊名,自然是因为“自由是美利坚的代表神”。在这里从一个美国编辑的立场,表达了对“自由”的理解和阐释,间接地传递出在中国经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屠杀情形下对民族独立、渴望自由的深切呼喊,也曲折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疯狂暴行的抗议和愤怒。这种隐意我们可以从该刊封面的木刻内容得到启发和印证。

《中美日报》(1938年11月1日—1946年3月31日)由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邵洵美与该报关系很是密切,尽管现在无法找到有关史料证明他是否参与该报的编辑活动,但其在该刊“集纳”栏目发表数十篇文章也许可以从某种角度作为佐证,当然其与该栏目编辑张摩矩(即张若谷)两人很熟络也有关系。邵自1938年11月11日至1939年5月在该报“集纳”栏目发表“访华外国作家系列”10篇、“金曜诗话”31篇。

《中美日报》和《大英夜报》一样,都是以大量报道我国抗日战争各方面的消息为主,同时对国内外各方大势进行分析评论,积极引导和动员多方面力量支持抗战。邵洵美从自己的职业和创作的角度,在“访华外国作家系列”、“金曜诗话”系列文章中,对外国多位文艺人士在抗战时期的活动进行广泛介绍,对有关抗战民族大业的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和现代诗歌理论作了分析和探讨,也是对该刊发刊词和社论的思想的配合和呼应。

邵洵美之所以如此做,首先和其长期的办刊经历和浓厚的兴趣有关。邵洵美对于办报刊可以说非常痴迷,异常投入,甚至不惜全部家产,他这种情形和状态是一般人或局外人很难理解的。他在幼儿时就自办手抄报,1927年正式进入出版界,在抗战前就曾出资或参股、主编或参编十余种文艺期刊,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也对报刊的社会作用有很深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刊理念和思想。抗战爆发后,他仍义无反顾地投身办刊活动中,不断调整其办刊思想观念,使自己的行为融入到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去。其次,邵洵美作为生长在当时的大都市上海的一个文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身经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也熟悉中国现代文人与现代传播媒介、出版活动的紧密关系。变

化了的社会时代把现代文人与现代出版传媒牢牢的绑在一起，他们别无选择。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只能以文为生，投身于出版业，埋头于文稿书稿、排版印刷、出版营销，以文为生，不仅是现代许多知识分子的职业，更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说抗战爆发前邵洵美与靠卖文为生的大多数文人不同的话，是更多的专注于自己的兴趣，醉心于自己的喜好；这时的邵洵美与他们已无区别，写稿、办报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养家糊口，能活下去。抗战爆发后，邵家上有老人，下有众多的弟妹，还有家族亲朋，骤然间失去了生活来源和足够的可靠保障，邵洵美作为邵家的长子，不能不为之操劳奔走，但因上海的家产尽数毁于日寇的炮火，乡下的钱庄、当铺也相继停业，最终无计可施而陷入靠典当妻子仅有的首饰度日的艰难困境。无奈之下，邵洵美只好重操旧业，回到自己过去熟悉的老本行——卖文、办刊。对此，他在《自由谭》上连载的《一年在上海》中有所述说。被困“孤岛”的环境中，他“觉得要工作的话，仍旧不如办刊”。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我的东西完全打光了，没有钱当然不能办杂志；靠写文章是不能生活的；除了出版又没有别种生意经验”。面对时局，他思来想去，“写文章人除了写文章，真是一些没有别的用处，我到今天才相信了这句话，明白了这句话的重要。”

在敌寇占领的环境，每个生命存在的物质保障条件都尽失了，个人的生存本能、愿望、冲动和民族国家要求未必都是一致的，生存的本能和内心渴望与民族气节会产生冲突，每一个人都被置于人性、道德的底线上接受无可逃避的重大考验和心灵诘难，每一个人也都毫无选择地做出自己的抉择，因此，有人以死抗争，置生死于度外而奋身以赴国难；有人苟且偷生以全己身；有人则投敌附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叛贼，为世人所不齿。在生存环境极端恶化甚至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生之不弃与保守民族骨气是难于两全的，更是难以选择的，邵洵美的选择是值得称道的。虽为生计所迫，但在炮火硝烟弥漫的险恶环境中，在各种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邵洵美仍旧寄望于自己一向崇尚的事业。邵在《自由谭》创刊号“编辑谈话”里谈到其当时办刊的实际情况：

今日之下，要在上海出版一本正式的中文定期刊物，眼前便拥挤着各种的困难。一般出版家都已迁移到汉口，广东，香港去了：于是垫本难找老阔，推销缺少内行。大部分著作家，或则为了躲避危险，或则为了接近市场，也都离开了上海；现存的杂志与报章的编辑人莫不叹息著稿荒。……《自由谭》的出现便不能不说是希（著者注：“希”应为“稀”字）有的盛典。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缺乏作家、合作商、营销人员，加上读者购买力的低下，要办一个非营利的定期刊物，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了。但即便如此，邵洵美仍把《自由谭》的创办看成是一个稀有的“盛典”，足知其投入的热情的炽烈和寄予的期望的深切。

诚然，对于邵洵美这种在常人看来颇为惊诧的举动必然遭到人们的误解。邵在《自由谭》上连载的《一年在上海》中对此做了解释，也表露了其醉心于办刊物的动机、目的和思想。面对朋友的误解，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有朋友“极其郑重诚恳”“训斥过我出版的毫无目的”，“我说出版便是我的目的”。这正是邵与常人迥异之处，他期待有朝一日自己的刊物能像英国的北岩爵士那样用《答问周刊》、《每日邮信》“造成几百万读者”。被困“孤岛”的环境中，并没有使邵洵美因此放弃自己的梦想，相反，燃烧的报国热忱使他“忘却了这世态的炎凉，满腔满怀冲动着为社会服务的热诚”。自己办报，给自己和要说话的人们提供一个说话的地方，能自主表达自己的看法，能及时传递有关战争、社会的消息，架起“孤岛”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这让他决定选择这种快捷而又可靠的媒介，把解决生活生存问题与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

邵洵美在办刊、在卖文以度危难的过程中，坚守民族大义是首要的。他对“战争文学”的倡导始于其对民族危亡的极度忧患，也基于他对文学观念的一贯坚持。

在《自由谭》第1期上，邵洵美直接以《战争文学》为题，对“战争文学”的必要性、宣传与文学的区别、“战争文学”的内涵等做了申明。在该文中，邵洵美将“战争文学”与宣传性的新闻报道文字做了区别，但他并不是反对服务于抗战的后者，只是出于对文学的自觉追求而更重视前者。邵指出，宣传性的新闻报道文字具有即时性的特点，其“目的在鼓励民众的情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与同情，鼓励民众参加抗战的热情和斗志，“但是这类的文字目的既在宣传，形容描写当然要过分地夸张”。而“真正的战争文学”“并不有想要在短时间发生效果的宣传性质”，其“主观的作品”注重内心情感和意识情绪的“流露”与“发泄”，“热情的表现与痛苦的寄托”；“客观的作品”更突出“所耳闻目睹的经验之忠实的叙述与记载”。这些作品也许并不会一时产生轰动效果，也许“是在满足他们当时个人的要求”，但“纯粹文学是诉于更深一层的心理要求的”，“这种战争文学却能在文学占有永久的位置”。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邵洵美所以提出重视‘真正的战争文学’，鉴于在战争环境下，新闻报道式的

宣传文学兴盛而纯文学创作相对萎缩的现象。邵洵美希望作家，尤其是孤岛上的作家能沉潜下来，写一些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④当然，至于谈到作品表现内容的“主观”和“客观”问题，可能并不像邵洵美所说的那样可以作泾渭分明的区分，而更多呈现的是混合交织的复杂状态，其主导倾向大致有所侧重罢了。

邵洵美提倡“真正的战争文学”并不排斥和反对文学发挥宣传作用，这点可以在他发表在《中美日报》上的《抗战中的诗与诗人》（1938年11月25日第八版“集纳”栏目）得到证明。在这篇文章中，邵针对古今中外关于文学文体优劣短长的争论，认为在当下的抗战时期已没有太多的意义，在抗战时期，“诗的确是可以深入人心的宣传工具；但是深入人心的宣传工具却并不只是诗。以文学宣传来讲，那么，无论什么体裁，只要运用得当，都能深入人心而发生所需求的效力”。战争的环境与和平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对文学提出的要求不同，这也决定了文学特定的内容与形式，在抗战中，“我们可以说：‘发生宣传效用的诗便是好诗’。在抗战时间的诗已不能与太平时间的诗相提并论了”。

不仅大力提倡“战争文学”，邵洵美还积极进行“战争文学”的实践，在《自由谭》第2期至第7期上刊发了《一年在上海》，在第1期上发表《游击歌》（署名“逸名”，此为邵洵美的笔名），赫勃脱·吕德著、钟国仁（邵洵美的笔名）译《轰炸惨案——西班牙》，在第4期上发表奥登著、“邵年”译（“邵年”为邵洵美的笔名）《中国兵》。

邵洵美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这里发表的《一年在上海》。它是邵“所耳闻目睹的经验之忠实的叙述与记载”，当然也有内心情感和意识情绪的“流露”与“发泄”，“热情的表现与痛苦的寄托”。该文叙写了由于没有搬场的费用而致在大战来临之际却无力举家逃难，陷入极度艰窘之地，在借债、逃难中感受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也体味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更深切觉察到战乱中的人心畸变。他向朋友们解释为何自己没有离开上海的原因、曲衷，也流露了内心充满的委屈和痛苦、失望。这种“清算”也让他明白并坚信了自己的出路：“到了最后，觉得要工作的话，仍旧不如办刊物。”在友人的帮助下，经过与三家报社的接触，最后重操旧业，创办一个双语刊物，这就是《自由谭》。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他有时写稿十几个小时，尽管很疲惫却感到心里很舒服，前后完成了《孔子论诗》等数十篇诗论及许多著述。

为了扩大“战争文学”的影响，邵洵美在《自由谭》上积极推出其他作者的诸多“战争文学”作品，其中第2期有泳清的《夜袭》、达祖的《避难记》、曾迭的《吃角子老虎的命运》；第3期有徐訏的《一页》、禾子的《偶人的话

串》、曾迭的《毁楼随笔》；第4期有陈克定的《离沪八日记》、言言的《在最落后的一角里》；第5期有念萱的《“良民”日记》、杨彦岐的《一个美丽的奇迹》、杨刚的《焚书毁信离北平》；第6期有甘石的《十二点半》、念萱的《“良民”日记》；第7期有念萱的《“良民”日记》、马克珊的《做了半天汉奸》等，与邵洵美提倡的“战争文学”及文学实践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应该说明的是，邵洵美对“战争文学”的倡导既强调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民族国家立场，但邵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作家，其自由主义立场也是鲜明的。因此，他审视文学时的政治视角不是自然选择和必然结果，他更强调从“人”的角度、从“文学”角度来看待“战争文学”，立足于“纯粹文学是诉于更深一层的心理要求的”，“这种战争文学却能在文学占有永久的位置”的超政治的期待，这也许是一种独到的理解和认识。我认为可以把邵洵美的看法当做是对“国防文学”倡导者和“两个口号”论争者对文学与战争的关系的认识的一种补充。

三

邵洵美不仅倡导“战争文学”，而且以自己的行动投入到抗战宣传活动中。首先自己写作宣传文章，如《安置战时妇女和儿童》（《自由谭》第1期），结合战争环境及动员更多的民众参加抗战的具体要求向参政会参政员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次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凡是有血气的国民都应该为国家民族负一份责任，要使不论上前线杀敌还是在后方服务于抗战事业的无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应当设法使为国奔命者不要顾虑家室，使顾虑家室者仍能为国奔命。解决这个问题，便非有安置妇女儿童的具体办法不可”。

更值得一提的是邵洵美直接参与了《论持久战》在沦陷区的出版传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38年5月在延安发表后，为了更好地正确地指导抗战，宣传持久战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当这部重要文献传到上海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要求尽快将其翻译成英文向国内外传播。承担这一重要使命的是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杨刚。杨刚在上海就住在邵洵美创办《自由谭》的合作者、好友项美丽家里，这里也是《自由谭》（英文版《直言评论》）的编辑部所在地。在杨刚翻译《论持久战》的过程中，邵经常帮助润色、修改，最后在《直言评论》第3期至第6期（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上以“Prolonged War”的题目，译者署名“Shi Ming”（失名），连载了《论持久战》。在正文前有一段编者按语介绍道：“在这个连载中，它首次以英文出现。此卷包括文章所有内容。考虑到大众的时间有限，略去了详细讨论战术的部分。不过，失名所译

的英文全文近期将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1939年1月20日，在延安的毛泽东还特意为单行本的《论持久战》写了一篇千字序文，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此文由邵洵美译成英文，附于文前，杨刚写了《译者序》，序文记述了翻译的情况，其中也表示了对邵洵美的帮助的感谢。后《论持久战》在邵洵美等人筹划及工友们的大力协助下由其在白克路的印刷厂印刷，一部分经由杨刚通过地下党组织渠道向外发行，一部分由邵洵美等发送给在沪的外籍人士，使这部在中华民族抗战事业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的历史文献在沦陷区得以迅速传播。^⑤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明，其实，在杨刚的译文正式发表以前，邵洵美就已经在1938年10月1日出版的《自由谭》第2期“自由谭”栏目里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关这样的介绍：“毛泽东先生的新著便值得人赞扬了。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这应是在杨刚翻译《论持久战》之前或过程中，邵已经看过这部著作，对此也极其欣赏，如果联系邵以“逸名”笔名发表《游击歌》，以“邵年”笔名翻译奥登著《中国兵》，署名“逸名、台勒”的《关于游击队的辩论》等诗文来看，邵对开展游击战的形式抗击日本侵略的高度认同，与他接受《论持久战》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所以邵在《自由谭》上对《论持久战》的介绍是发自内心的首肯之词。

再者，邵洵美还著文及时介绍文艺界动向，广泛联络国内外文艺界，传递国内外有关信息。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文艺家的整体状况，从生活、职业到心理、情感，也由于战乱时期，阻断了通信往来，失去了联络，无法沟通和呼应，因此，在国难当头之际，要求中国文人作家团结起来，共同为民族自由解放事业鼓与呼。

如邵洵美以“都仁”的笔名在《自由谭》第1期上发表《中国新文人统一的力量——留守在上海的文人消息》一文，就是对这种时势的呼应，向外界介绍、通报了身处“孤岛”上海的文人的具体状况。留守在上海的作家有几十个，有各种各样的谋生手段，有的生活也很艰难，但“这遗留下的作家们确实有镇守在上海的必要”，“上海的文化生命，将完全依靠在他们身上”。在这里介绍了一些作家的近况，有徐訏、张若谷、林达祖、郑振铎、傅东华、林微音、朱维基、芳信、阿英、黄嘉德、邵洵美、曾迭、顾苍生、章克标、孙大雨等。他认为，“这次抗战中，文人所表现的态度，使人对中国文化前途抱莫大的乐观”，“更使外人莫不惊异这统一运动的迅速和彻底”，这是抗战最大的成就。他希望留守上海的文人“更应当互相亲近和了解”，要抓住“这统一的机会”。邵对中国文人在

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团结一心，共同御倭，是寄以热切期望的，也反映了他的满腔热忱和赤子情怀。邵洵美的这种呼吁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这就是徐迟的《旅港文化人新闻片一号》（刊于《自由谭》第6期）。文中对旅港的文人金克木、萧乾、张高峰（即张鼓峰）、杜衡、戴望舒、夏衍、叶灵风、穆时英、卜少夫等人的情况作了介绍，指出虽然这些旅港的文化人被人骂过“荒淫”、“忘记了责任”，但这个时期的旅港文化人确实没有忘记“抗战的责任”。

邵洵美还利用“孤岛”环境下租界的特殊地位，滞留、寓居上海或往来于上海与海外之间的诸多国外文艺家与其接触交往较为密切的便利条件，加强与国外艺术家的沟通交流，及时传播国内外文坛信息。据邵洵美在《一年在上海》（《自由谭》第4期）中的述过，他在想办刊物而未果的情形下，忙于写文章，这时“到我家里来的，外国人反而比中国人多了”，“这一个时期，外国报馆特派来的新闻记者很多。他们大半和密姬（注：即与邵合办《自由谭》的好友项美丽）熟识，所以到上海，总由密姬带来看我。他们和我什么话都谈，完全不像陌生人。他们同情中国，几乎热烈得像宗教信仰”。正是这种频繁而密切的交往、接触、交流，使邵洵美对各国文艺界的情况多有了解，方才有其在《中美日报》上的“访华外国作家系列”文章。

邵洵美自1938年11月1日至14日以“邵年”的笔名在《中美日报》“集纳”栏目发表“访华外国作家系列”共10篇，在此之前还有一篇算是这个“系列”的开场白——《在中国的外国人》，文章交代说，“我”预备每一篇记述一个人：“有的我熟悉有的不熟悉；有的我熟悉他，他不熟悉我。但是在这里，先发表‘八·一三’以后所认识的一部分，他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的‘中国友人’。”该“系列”集中介绍了一些外国作家，或以“战事访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搜集、采访战事新闻，如《访华外国作家之一 美国名记者聂克蒲克——普烈士新闻奖金的获得者》（发表于1938年11月2日《中美日报》第八版“集纳”栏目）中聂克蒲克因为采访得到了“许多特别”的消息，得了普烈士新闻奖，“他是美国新闻大王赫斯脱手下的名记者，是当代数一数二的战事访员”；还有《〈欧洲内幕〉的作者——约翰·根室的登龙术 访华外国作家之九》（刊于1938年11月12日《中美日报》第八版“集纳”栏目）介绍的约翰·根室（John Gunther），《欧洲内幕》的作者，该书畅销几十万册，约翰·根室获得了新闻记者最高的荣誉地位，今年春天美国几家著名日报的一个联合机构请他到远东来采访新闻，等等，利用其所依托的报刊及时宣传、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有的自己来华进行战地采访，撰文著书，在世界各国引起轰动，如《〈西行漫记〉作者——史诺和他

的夫人 访华外国作家之四》（刊于1938年11月5日《中美日报》第八版“集纳”栏目）、《一部活动的西行漫记——史诺夫人印象 访华外国作家之五》（刊于1938年11月7日《中美日报》第八版“集纳”栏目）两文介绍的史诺夫妇，他们曾到延安采访，其著《西行漫记》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些在华外国友人有的长期在中国生活，有的因采访新闻的原因到过中国的上海、汉口、青岛、广州、西安等地，亲眼目睹了日本炮火轰炸下中国城市、村庄遭受的空前毁坏，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奸淫等惨绝人寰的暴行，如《萨姆生从广州来——给上海人报告真相 访华外国作家之八》（刊于1938年11月11日《中美日报》第八版“集纳”栏目）一文，作者在《自由谭》第5期上发表过《汉口失陷的前后》，路透社的摄影记者，平时也为报章杂志撰稿，曾在汉口、广东等地住了两三个月，“看见日本飞机第一次的轰炸和末一次的轰炸；他看见一个熙攘的村庄烧成一堆灰烬；他看见多少处快乐的家庭在一刹那间变作血肉狼藉的坟墓”。《揭破〈日本在南京的暴行〉——仗义执言的丁百里》（刊于1938年11月9日《中美日报》第八版“集纳”栏目）介绍了著名新闻记者丁百里，他是英国人，在中国上海、北平等地住过多年，《孟却斯特导报》的驻华访员。他在几个月前在英国众议院里报告过日本暴行的真相，轰动了全世界的舆论界，后来出版举世闻名的著作《日本在南京的暴行》一书，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屠城的灭绝人性的暴行。

四

上海沦陷后，邵洵美隐居家中，终日以书为伴，时有张光宇、张振宇、季小波、王敦庆、林微音等来访。潜心研究邮学，颇有心得。日伪前来游说、拉拢，让邵洵美出面与重庆政府沟通，以谋求“中日议和”，皆遭到邵坚决拒绝。为摆脱敌伪的纠缠、迫害，以明自己的心志，恰逢好友万籛鸣来访，决计前往重庆。由万籛鸣带路，携长子祖丞（即邵小美）与老友但茱荪同行，在抵达杭州后因战事阻止，在杭州停留数月。

这期间，失去了写作的环境，刊物在受到日伪特务警告后被迫停办，邵洵美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根基荡然无存了，但他仍固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和民族大义操守，无奈转向邮票的收集与介绍，聊以卖文为生，直至支撑到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到来。邵洵美曾在陈志川编辑的《国粹邮刊》上发表《民国试制票中之珍品》、《万寿大字长距新变体》、《清红贰分修饰新变体》、《总理侧面像试制票之发现》、《谈集邮》、《华邮中之珍品与贵票》（一、二）、《集邮小问题》、《集邮的兴趣》等文，而后又在上海《新申报》上连载集邮文

章《中国邮票讲话》60篇，署名“初鑫”（邵洵美的笔名）。

邵洵美在极其艰难困窘的境况下，始终不放弃对民族解放的信念，并积极为抗战事业服务。尤其在沦陷期间能够不为利诱、刻苦自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守了一个中国人的道德情操，捍卫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这在一贯“锦衣玉食”的他更为难能可贵。

注释：

- ① 邵绍红：《诗人邵洵美的烽火岁月》，《文汇报书周报》2005年6月17日。
- ② 为了保持引文的原貌，对其已不符合现在语言语法习惯或规范的字词句并不做修改，仅改动个别文字，特作说明。
- ③ 盛佩玉在回忆邵办《自由谭》的情形时谈道：“洵美同时在家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开本的图文中文月刊，名《自由谭》，封面上三个大字是他自己写的‘洵美体’。内容是抗日的。创刊号封面画是一个手托被日机炸死的孩子的悲愤的农夫。《自由谭》是大刊本，我记得洵美选印了一张画：一个日本女人在走绳索。后被日本当局发现不准印刷厂再排印，只得停办。依靠密姬（密姬即项美丽，编者注），为他在外文印书厂中印出来。”（《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姜德明撰文推测，《自由谭》的主编和发行人名义上是项美丽，实际上是邵洵美。他分析道：“也许正是邵考虑到当时租界的‘孤岛’环境，有意请一位外国人来出面办理杂志，借以躲避日本占领军的阻碍。……这种办刊手法，在当时‘孤岛’亦决非一例。”（《邵洵美与〈自由谭〉》，《文汇报书周报》2000年1月29日）
- ④ 王京芳，《邵洵美与文艺抗战——以〈自由谭〉为例》，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第183页。
- ⑤ 有关毛泽东《论持久战》在孤岛时期的翻译、出版及传播情况，详细内容请参阅邵绍红著：《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196页。

[张新民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邮编 510521]